



境遇·镜像

中国美术与“国家形象”研究

孔新苗 |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JINGYU · JINGXIANG

境遇·镜像

中国美术与“国家形象”研究

孔新苗 |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宫 共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境遇·镜像:中国美术与“国家形象”研究/孔新苗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5

ISBN 978-7-01-014768-0

I. ①境… II. ①孔… III. ①美术-研究-中国 IV. ①J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76583 号



境遇·镜像

JINGYU JINGXIANG

——中国美术与“国家形象”研究

孔新苗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5

字数:318 千字

ISBN 978-7-01-014768-0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当代中国美术与国家形象塑造研究》(10BF043)成果之一

“十二五”山东省省级重点学科艺术学学科建设资金资助

前言

20 世纪中国美术研究一直是我的学术工作重点。多年工作中产生一个感受：从“五四美术革命”到今天，在这一百年左右时间里中国美术创作、研究的整体性问题意识、创作动力、学术关怀，始终针对了国内的社会变革、文化更新的现实语境及意识形态表征，对“国家形象”之于世界视域中的自觉塑造相对模糊。或者说，从“写实改造中国画”到现实主义美术创作观；从新中国美术到“中国当代艺术”；从“文革”美术到艺术市场化……中国美术剧烈变革、日新月异的一百年，主要面对的是自己的千年传统问题、社会与文化变革问题、经济建设与体制建设……这一系列的国内问题，而这期间在国际交流中生成的“国家形象”，只是针对国内问题的美术实践所“不自觉”而表征的形象。

今天看来，这种形象塑造的“不自觉”，一方面导致了处在“改革开放”期的中国美术在一段时间中把境外他者的眼光当成“客观的”、“现代的”眼光，而部分丢失对自我形象自塑的自觉、自信，一意模仿他人做派甚至成为流行；另一方面，又往往粗简于与他者主动对话、自我反思，而以传统文脉深厚、当下创作繁荣为由，自以为“形象”是会自然生成的，忽视了在现代传媒的境遇中，他者通过“镜像”的无法回避的外在塑造力。这正如一个人在镜子前的自我审视：一意模仿“明星脸”难免东施效颦；自信对镜中像的自我理解，则是遗忘了无处不在的“现代性”（境遇）对自我理解本身的观念、取向的塑造（镜像）——看镜之眼已然不是纯然的“自己的”眼。

在这个意义上,从“境遇·镜像”的角度反思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中国美术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历程,就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考察前面所谓的“不自觉”中内含的“历史自觉”;揭示他者话语对我们形象自塑的“镜像影响”,从而为在经济全球化、互联网信息化的 21 世纪新境遇中,提供从新的问题意识出发、从新的学术视角出发的“形象自觉”解读。为实现中国梦的中国美术“走出去”新历史使命,谋划实践理性的策略。

在学术方法论的层面,解读 1949 年之后中国美术对“国家形象”的表征实践,不可能脱离起源于西方文明的“现代性”话语。换言之,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是在与人类社会发展现代性境遇的密切关联中生成的。同时,源自西方的现代性思想又是形成于、实践于跨文化、跨文明的人类世界“公共空间”中的,是世界不同文明之间多元互动、相互作用与相互塑造的历史过程。这就形成了描述中国美术与“国家形象”关系的基础二维视角:从西方看中国;从中国看西方。在两者的交汇处,“形象”的辨析与解读才具有科学的、历史的意义。其既要历史中出现的具体话语文本进行语境梳理和细部实践意义分析,又要求在不同话语系统之间建立起一种整体性的关系结构,发现某种形象想象、形象呈现和形象解读的类型化特征以及由不同类型构成的、具有断裂、转型与连续性的话语谱系。具体体现为:梳理新中国诞生以来中国美术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实践;揭示这一塑造实践在具有千年传统的中国文明史、文化史背景中的现代话语意义;分析这一话语意义之于国内、国际两个共时态语境间的互释、误读、切割、拼合之中意义生产的交错关系……通过一系列的解读而建构中国美术塑造“国家形象”的历史脉络,正是本研究的工作目标。

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的过程中,关于“中国美术”的文化学内涵、学科知识结构、话语体系建设之范式匮乏感,成为我对中国美术在 21 世纪建设发展的新的问题意识。在本研究的后部我力求从研究主题入手介入这一问题,却深感力不从心。21 世纪的中国美术文化建设,需要在鲜明的跨文化、“走出去”的问题意识中,重新思考自身的学科知识范式更新问题。显然,新范式既不能是想好了、说清了再去干的规划与概念;也不能是“走着看”的顺其自然,而是需要成功的实践案例、失败探索、多元整合的过程中生成、提炼、建构。目前清晰的起点是:这个“想”和“走”的过程,需内

含中西美术文化百年碰撞的话语堆积；跨文化交流的多维互动、多向绵延、反复误读与意义生成的话语脉络把握；中国文化把握天下、把握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文化哲学及其在新世纪实践中的文化自觉意识。如此，“中国美术”作为一个文化史的概念、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的范畴、作为人类文明独一无二的符号系统，其在 21 世纪的人类文化交流中将展现怎样的话语力量？以什么形象示人？正是“国家形象”在美术文化中最基础的建设课题。

前言，总是在文本完成之后写成而跑到最前面来“言”。回顾本课题历时五年的思考与写作过程，既感内心充实又因结果离目标尚远而汗颜，唯一聊以自慰的，是自己在学术共同体中迈出了这笨拙而跌跌撞撞的一步。

孔新苗

2015 年春

目 录

前 言	1
国家形象研究：语境·方法	1
一、人文语境：新世纪的新视野“文化自觉”	3
二、热点话题：中国美术现代性与“国家形象”	14
三、形象研究：方法·历史·镜像	21
（一）方法：关于形象研究的两个基本范式	22
（二）历史：中西互视的三组形象类型与启示	25
（三）镜像：多维视角与解读中国美术现代性	30
四、视角与逻辑：作为叙述策略的“二项对立”	39
新中国与冷战世界：塑造·镜像	42
一、世界与国家——空间中的革命与历史中的人民	45
（一）天下/国家——断裂：历史的偶然与必然	45
（二）思想/实践——建构：“领导权”与新文艺	56
二、阶级与民族——工农兵形象·写实造型·民族形式	73
（一）新范式：符号生产·生产机制	76
（二）新美学：想象与真实·写实与抒情	89
三、抽象与形象——冷战世界中的艺术热战	138

(一) 符号的战争——形式主义·人道主义	139
(二) 符号再生产——从“纪念碑”到“收租院”	180
全球化与中国: 自塑·他塑	212
一、新格局: “POST-”	212
(一) 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	215
(二) 两个“危机”与两个“文革”	221
二、新表征: 范式匮乏	230
(一) 文化故事与意识形态	231
(二) “内视/外视”的悖论	244
(三) 想象现代与消费符号	249
现代中国美术: 历程·转型	262
一、两个境遇与两类符号	265
(一) 另类现代: 和平、建设与“反帝反修”——50—70年代	266
(二) 想象现代: 形式“现代派”与遗忘十七年——80年代 转型	268
二、学科范式与实践意识	270
(一) 中国美术学科建构中的知识—权力关系	270
(二) 新实践的关切点: 批评自觉	277
结语: “走出去”·马赛克效应	281
一、问题意识·文化自信·策略设计	283
二、软力量·本土成长·泛传播	289
三、实践: 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	295
主要参考文献	298

国家形象研究：语境·方法

进入新世纪，如何理解“中国”，叙述“中国”，在图像传媒中呈现“中国”，在艺术形象中塑造“中国”……以及对这类文化实践行为的意识形态自觉与批判，成为一个日益被学界、艺术界甚至普通大众关注的议题。这一现象，源自特定的历史境遇：外部，中国在全球格局中作为经济、政治大国的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升，必然带来世界对“中国”的解读从不同利益角度出发的认识与分歧。所谓“中国崛起”、“中国威胁”论的出现，不仅是指中国经济、国力的持续增长引发国际舆论的正面、负面效应，更是中国的现代发展进程逐步清晰了一套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政治哲学思想^①及与其匹配的现实政治体制、制度，其在全球格局中引发的关注，在对抗资本主义“历史终结论”话语中启动的实践^②，必然导致对“中国”理解与评价的众声喧哗。内部，中国社会的现代进程正面临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社会体制问题凸显的改革关键期，在与国家外交活动相对的普通大众的生活体验中，通过奥运会、世博会和大量国际工程建设、贸易交往、出国留学、私人旅游等等，中国普通人与世界的对话及其效果体验，日益变成了普通人身边、家庭的种种“事件”；同时，国内的自然环境、民生、城镇建设这些与普通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体验，又日益被置于“全球”的背景下与国家的文化

① 参见强世功《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73页。

② 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

形象、政府的社会责任来关联理解，而不像以往仅从“资金投入”、“技术水平”的角度去找原因。换言之，在现代全球经济、政治博弈中，由跨国公司、网络传媒、视觉文化与文化产业几大要素构成的新语境里，“全球化”作为现实生活情境；“中国形象”作为上至国家外交下至大众生活的现实体验，两个关键词所表征的现实生活世界新境况，构成了在新世纪关于“国家形象”叙述的基本背景：“中国形象”正处在一个自塑、他塑频繁、深入互动的变化敏感期。

关于“国家形象”这一概念的内涵，目前诸多研究文本基本采纳管文虎主编的《国家形象论》的定义：“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① 吴友富在《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一书中认为：国家形象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加以界定。广义的国家形象是指特定国家内部公众、外部国际公众通过复杂的心理过滤机制，对该国的客观现实（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以及所作所为）形成的具有较强概括性、相对稳定性的主观印象和评价；而狭义的国家形象仅是指特定国家的外部国际公众通过复杂的心理过滤机制，对该国的客观现实形成的具有较强概括性、相对稳定性的主观印象和评价^②。李正国在《国家形象构建》一书中，将“国家形象”分为“我形象”、“他形象”和“错位形象”三个基本方面。“我形象”是形象主体主观追求却没有得到他者认可的一种内在的自我主观形象；“他形象”作为我形象的对立面，是形象主体的对面他者所解读出的形象表现国的形象，是一种来自国际社会或特定他者的观察想象形象；“错位形象”则是由主观的国家形象表现与他者形象解读的理解交错而形成的、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表现形态，即某国的国际形象受到强有力的第三方的认可或颠覆，而产生的短期形象。^③ 人文学者张法认为：“第一，国家形象本是一个动态的多样性综合”，对这种动态特征缺乏描述的理论定义，常常没有包含国家形象这一基本特点；“第二，国家形象的总体评介是一个不断形成又不断地被修改和重评的动态过程”，定义中须包含对认定、修改、重评的机制描

① 管文虎主编：《国家形象论》，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3 页。

② 吴友富：《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③ 李正国：《国家形象构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述。他在诸种“国家形象”定义中提炼出两个具有共性的特征,“一是国家形象的可塑性,二是国家形象塑造的功利性”^①。

本研究始终把握“境遇”作为视角,关注“国家形象”在不同的国家建设历史阶段、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交往环境,以及由这些自身目标和外部条件互动所建构而成的“国家形象”表征、传播、解读的话语秩序,在一个变化的历史语境中把握“国家形象”生成、变化的实践机制。

本研究以形象学、符号学、跨文化交流理论为方法论依据,通过“镜像”范畴所内含的形象自视、自塑、他塑、传播、反馈的理论视界,分析走出传统文化形态的20世纪一百余年间中国现代性进程对“中国”理解的文化观念变化;这些变化在美术创作中的形象呈现;不同政治力量与文化力量介入这一呈现过程的建构与退隐、聚集与分流、缝合与断裂的形态关系,进而通过对这些矛盾生成、过程演变、形象呈现、批评思想博弈的梳理,描述中国美术表征“国家形象”的历史情境与意识形态。

如此,本研究中的“国家形象”总是被引号引起的,以标示其历史性、变化性、在自塑与他塑对话中被多义地呈现、解读的特点。从而力求为今天面向世界欲“走出去”的中国美术彰显“中国气派”、塑造“国家形象”,提供具有理论深度与实践意义的研究阐释。

一、人文语境:新世纪的新视野“文化自觉”

关于“中国”,20世纪百年中曾经有过这样三个基本的叙述框架:1.以源自西方的“现代化”逻辑,哲学观念、社会体制的现代范式建设为导向的启蒙主义叙述框架;2.国际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与冷战地理格局划分的叙述框架;3.起步于中国自身文明传统和文化历史的民族主义的中国的叙述框架。显然,这些曾经一段时间中主导了对中国形象的自觉与塑造实践的观念体系,已经难以适应、整合在21世纪全球化处境下经济、政治实力逐步强大,日益深度参与国际关系博弈的现代中国形象塑造。今天,如何“叙述”中国、“呈现”中国,不仅意味着如何把握当下

^① 张法:《国家形象概论》,《文艺争鸣》2008年第7期。

的中国与世界的现实关系，也意味着如何“设计”中国，如何在面向未来的国家形象建构中践行“现代中国”的文化理想。

在现实语境分析的意义上提出“新世纪的新视野”，主要并不意在其物理的时间含义，而是针对了新中国在20世纪中的50年建设历程，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逐步生成，在近年来逐步增强，并由一系列思想阐发、学术文本、文化活动、社会现象构成的新的解读“中国”的新实践、新思路为根据。自然物理时间只是这些新现象借以发生的历史地形，碰巧在世纪之交。

这些新思想、新现象可以用“文化自觉”来概括。

“文化自觉”作为关键词在人文学界的明确提出，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的系列讲话与文章。关于“文化”，费孝通先生从马林诺夫斯基对文化的定义谈起：“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其他人们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一切其他能力和习惯。”文化的内容“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和“作为社会成员的一切其他的能力和习惯”的社会组织部分。对这个“在一般的语言里，还没有一个一致公认的含义”的概念^①，费孝通先生给“文化”一词这样的理解：“人逃不出这个客观的自然世界，但是人有能力可以利用这个自然世界来创造一个人文世界，用人文世界来利用自然以取得人的生存和发展。”所以“文化是人造的东西，是为了人的需要而造的”，“我叫它是个人造的人文世界”^②。而“自觉”，显然是相对于“不自觉”。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

① 费孝通：《从马林诺夫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

② 费孝通：《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读书》1998年第11期。

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①

如此,在世纪之交世界变化、中国自身变化及与世界关系变化的新境遇背景下,思考这种对“文化自觉”的强调,就具有一种深刻的意味。一方面,从在新的全球化时代中“叙述中国”的角度看,如果说以往“启蒙的”、“冷战的”、“民族主义的”叙述框架部分失效于新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语境,那么“文化自觉”就是在这一问题域中有针对性地开启了一个新的观念视野。“不能脱离实际,要坚持从实求知。当前最大的实际,就是人类社会从二十世纪向二十一世纪过渡时期的文化变迁。”^②中国要在这种变迁中发挥作用,为自身和人类共同发展谋福祉,对自身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则必然是基础的功课;另一方面,“文化自觉”还针对了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提出的“文明冲突论”^③,就其力图通过在世界不同文化文明之间划出清晰的地理边界、哲学观念与现实利益冲突的方法来说明不同文化之间发生对抗的必然性的观点,费孝通先生从不同的文化哲学视角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指出:

我注意到现在西方的欧美国家里出现一种把文化和国家这个制度挂钩的倾向。把国家的领土概念引申到文化领域中来,把不同文化划出界线,来强调文化冲突论。我意识到这种看法是有很危险的。如果边界的概念改变成“场”的概念,也许可能纠正这个倾向。“场”就是由中心向四周扩大一层层逐渐淡化的波浪,层层之间只有差别而没有界线,而且不同中心所扩散的文化场可在同一空间互相重叠。那就是在人的感受上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规范,可以自主的选择。把冲突变成嫁接、互补,导向融合。^④

这种不同于西方二元对立思维的中国式强调多边关系、多元动态交融

① 费孝通:《反思 对话 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② 费孝通:《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读书》1998年第11期。

③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④ 费孝通:《反思 对话 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的“场”论或“波纹重叠”论，正是超越“文明冲突论”而对新的21世纪人类现代性问题的更深度思考。是一个用中国式“推己及人”的文化自觉与“和而不同”的人类世界多元共生的伦理观，来建构全球化时代人类世界发展的哲学。

对于现代中国来说，首先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建立对中国自身现代化建设道路认定、实践的“文化自觉”，就是以我们的方式在21世纪对人类世界作出新贡献。“‘文化自觉’这四个字也许正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是世界各地多种文化接触中引起人类心态的迫切要求，要求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样生活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也就是说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要知道我们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这些冒出来的问题不就是要求文化自觉么？”^①

如果说费孝通先生对“文化自觉”的思考，是起步于对自己学术生涯与时代关系的反思，那么进入新世纪后人文学界围绕中国文化问题的一系列研究文本、学术理论的提出，则更意图鲜明地将关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特点认知、中国在全球传播中的形象认知等，作为理论阐释的主题。如2004年由国内一流人文学者推出的“中国文化论坛”（凯旋、策秀玉任理事会理事长，理事中包括陈来、陈春声、甘阳、黄平、刘小枫、童世骏、王晓明、王绍光、汪晖、余永定、苏力等），论坛力求回应的基本问题是：重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促进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

与此学术主题相呼应，2007年由甘阳主编在三联书店出版的“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丛书，沿用了1985年以甘阳为发起人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刊名。两个丛书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个有趣的观察20年间变化的人文景观。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语境中，那个编委会几乎囊括了人文学界新生代的主要成员，被称为80年代“文化热”中最重要的三个知识圈之一（其他两个：以金观涛等为代表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以汤一介、乐黛云、李泽厚、庞朴等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书院”）。当

^① 费孝通：《反思 对话 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时,以甘阳为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一圈,以突出现代性与人文性的问题意识,而区别于相对突出科学主义视角的“走向未来”;关注探索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解读的“中国文化书院”。20世纪80年代,甘阳等人在短短三四年间编辑出版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人文研究丛书”以及《文化:中国与世界研究集刊》等上百种出版物,重点介绍西方的人文经典及在这些视角下对中国问题的解读,其学术影响的突出特点,是建构了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冲突的历史叙事逻辑,提出“继承发扬‘传统’的最强劲手段恰恰就是‘反传统’”的观点。“当时是被看成全盘西化”、“编委会、整个丛书都是这样一个形象”^①。

而当过去了整整20年后,由甘阳出面再次组织的“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丛书,则明显在继续“从大文明格局看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视野”的同时,其理论视角和分析的立足点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甘阳在《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一辑发刊词《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为了促成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最需要完成的是“文化的现代化”,而这种文化现代化则需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根本的改造和彻底的重建”,中国的现代文化建设的立足点就是借力西方文化来批判传统文化。“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问题的大讨论,几乎总是与对西方文化的讨论和评价密不可分地纠缠在一起,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对中国文化的讨论本身就是‘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所促成的。”“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就在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地域文化差异常常被无限突出,从而掩盖了中国文化本身必须从传统文化形态走向现代文化形态这一更为实质、更为根本的古今文化差异的问题。”人们在进行中西比较的时候往往“由于过分强调了中国文化(确切说并不是中国文化,而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优越性?),这样的比较实际上也就有意无意地渲染、助长甚至论证了一种通常很少明言,但却确实实是根深蒂固的基本观念或基本态度:尽管中国社会要从传统形态(小农经济)跃入现代形态(大工业生产),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态却并不需要进行根本的改造和彻底的重建。……我们今日摆出一副中国文化正统传人的面孔来对‘五四’评头论足,难道不觉得有点滑稽

^① 参见查建英主编《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10—211页。

可笑吗？真正的问题根本不在于‘五四’这一代人‘否定得多、肯定得少’、‘隔断了民族传统文化’，而是在于，五四知识分子只是为中国新文化砌下了第一块基石，还来不及也不可能彻底完成建设中国‘现代’文化系统的任务，这个使命历史地落在了八十年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肩上，因为中国的现代化今日已经真正迈开了它的步伐，有幸生活于这样一个能够亲手参与创建中国现代文化系统的历史年代，难道我们还要倒回去乞灵于五四以前的儒家文化吗？！”^①

而甘阳在2007年版“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丛书中所写的总序《缘起》一文中，则突出强调了“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西方、重新认识古典、重新认识现代”的主旨，其核心观点呼吁“以中国文明的历史视野去看世界”。“之所以要强调‘重新认识’，是因为我们以往形成的对西方的看法，以及根据这种对西方的看法而又反过来形成的对中国的看法，有许多都有必要加以重新检讨，其中有些观念已根深蒂固而且流传极广，但事实上却未必正确甚至根本错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今天我们已经必须从根本上拒斥简单的‘拿来主义’，因为这样的‘拿来主义’只能是文化不成熟、文明不独立的表现。中国思想学术文化成熟的标志在于中国文明主体性之独立立场的日渐成熟，这种立场将促使中国学人以自己的头脑去研究、分析、判断西方的各种理论，拒绝人云亦云……黑格尔曾说，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近百年来我们过于迫切地想把自己纳入这样那样的普遍性模式，实际忽视了中国文明的独特性。”^②显然，这一发生在同一学人身上在20年间的鲜明变化，正形象地表征了中国学术知识群体随着国内、国际语境的变化而发生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演变现象，从一个侧面揭示“文化自觉”在今天走上前台的话语实践特征。

必须指出的是，“文化自觉”所开启的在全球化背景中观察中国传统、历史和观察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立足点、新视域，突出强调了观察中的“反思”、实践中主体性自觉的“发言”，而不同于文化保守主义用“传统”去对抗“西化”；不同于启蒙现代主义在“中国/现代”的二元关系中强调自身

① 甘阳主编：《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一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8—36页。

② 甘阳：《通三统》，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7页。